

梁弄战斗：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关键一战



陈国平

2023年4月23日，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攻打梁弄战斗胜利80周年的纪念日。梁弄战斗，是新四军总部和浙东区委着眼于抗战全局，开辟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关键一战。

背景与经过

1942年5月，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，浙江大部分地区变为沦陷区，日军加紧了浙东地区的军事、政治控制，在宁波、绍兴、三北等地增设据点，对“三五支队”发动“扫荡”。国民党顽军，也趁机制造摩擦。三北地区是狭长形的沿海地带，缺乏战略纵深，部队难以运动。为此，6月15日，谭震林致电陈毅、张云逸、饶漱石并报中共中央，提议“余姚地区武装，目前应向四明山区发展，求得建立一个宽广之游击根据地，并向敌新占领之空隙地积极发展……”9月22日，浙东区委又制订了“坚持三北，开辟四明，在四明山完全占领后，再争取

控制会稽山”的方针，为打响梁弄战斗、开辟四明做准备。

1943年1月，汪伪军第10师第37团1营，由余姚逃至姚南之后，占领梁弄镇，并在狮子山南北两个高地构筑了地堡、堑壕、交通壕，设置竹篱笆、铁丝网和鹿寨等障碍物。在狮子山102高地和民教馆南端，各构筑了一个有两层火力的大碉堡，从而构成了有完整火力配置的防御阵地，自诩为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。据守梁弄的伪第10师第37团1营，下辖3个步兵连和团属情报队一部，共200余人，配有轻机枪8挺，分三处进行了兵力部署。

1943年4月，浙东区委分析了形势和敌情，决定攻打梁弄，拔掉楔入四明山腹地的这颗钉子。4月22日晚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参谋长刘亨云，率领纵队第三支队和特务大队150余人，分三路展开进攻：一路由中队长肖松林、指导员骆子钊率三支队六中队，经金紫岙，迅速占领铁帽山阻击阵地；一路由中队长都曼令、指导员姚三林、副中队长李树海率三支队四中队，经铁帽山南麓，涉溪直扑狮子山主峰；一路是参谋长刘亨云率三支队主力及特务大队，沿着田间小路向梁弄镇进发，隐蔽在梁弄外圈，前进到金子岙，设基本指挥所，等待四中队冲击的信号，以便全面发起进攻。4月23日，战斗打响。经过长达16个小时的激战，摧毁了伪军在狮子山、民教馆、横街祠堂等处设防工事，残敌纷纷向上虞方向溃逃，“三五支队”占领了梁弄。梁弄之战，共毙伤伪军官兵40余人，俘虏上尉军官以下40余人，缴获轻机枪一挺，



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。(图片均据《宁波日报》)

步枪50余支。战斗中，“三五支队”亦有14名指战员牺牲，29人负伤。

历史意义

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与指挥中心。梁弄是四明山的中心，攻克梁弄后，一个以四明山为中心，包括浦东、三北、四明、金萧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。

浙东抗日斗争进入了新阶段。解放梁弄开辟四明后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相当数量的人口、一定的物资和后方基地，随着南山总办事处和余上、虞东、慈东等县级办事处的建立，战略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拓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锻炼了浙东抗日武装指挥员，提高了其组织指挥攻坚战斗的能力。从此，“三五支队”不断成长壮大，到1945年10月“北撤”时，队伍有上万人。

时代价值

必须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。梁弄战斗的胜利，离不开浙

东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。当地群众，有的拆下自家门板，抱来自己的棉被，为战士搭建掩体；有的配合民兵为部队烧水、送饭；有的在“三五支队”对驻横街祠堂伪军发起进攻时，与战士们一起从屋内打通一堵又一堵的墙壁，直抵横街祠堂。这些经验，对于促进新时代党群关系和军政、军民关系，具有重要价值。

必须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。梁弄战斗的胜利，对团结国民党军政人员共同抗日起了积极作用。国民党余姚县长夏铭章、上虞县长徐志余，联名给三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何克希写了贺信；鄞县自卫总队第三大队长郭青白，主动派员参加新四军西成桥战斗胜利的庆祝会。统一战线，无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，都是我们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。

梁弄战斗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和共产党人不怕困难、不怕牺牲，勇于战斗、善于战斗的大无畏精神，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，勇毅前行。

(作者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、宁波市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)

被打脸的悯农人



随思录

魏金星

又是一年春季，耘田耕播正当时。现如今，无论是倡导“节粮光盘”，还是强调“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”，在我看来，无不遵循着人勤春早的古训，于这片希望的田野，播种下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。

纵观诗家，在众多赞美劳动、体恤农家的诗歌作品中，最为出彩的，无疑是李绅的两首《悯农》诗了。

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
这两首诗遣词用意独到，通俗简朴，朗朗上口，既揭露残酷的剥削制度，种地人劳而不得其食，又具体形象地描绘了烈日下劳作的辛勤，劝导人们珍惜粮食，珍惜劳动成果，表达了对底层劳苦大众真挚的同情之心。

生活于唐朝中晚期的李绅，曾官居宰相之位，封赵国公，死后还被追赠太尉，谥号“文肃”。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，真正让他名垂后世的，不是生前显赫的权势，而是他的这两首《悯农》诗，被后人争相传诵，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之作。

有人说，“功名之士，必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；轻浮之子，必不能为敦厚大雅之响”。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文章，所谓“言为心声，文如其人”，指文章格调与作者人品一致。自古文坛就有从文签名、以品辨人的说法。文字承载着思想，思想反映在人格品位上。文章极处无奇巧，人品极处只本然。质朴本色，不粉饰矫情，才称得上好文章。故原有忧国忧民的赤诚，才有千古《离骚》；陶渊明有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骨气，才有种菊南山的后世声名；李太白有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傲气，才被誉为一代“诗仙”。至于曹孟德“横槊赋诗”的霸气、李易安“绿肥红瘦”的才气、岳武穆“怒发冲冠”的豪气，无一不是他们真实感情的表露，因而成就了一篇篇、一首首千古绝唱。

按说，诗人李绅既有如此深切

的“悯农”之心，更应该行其“悯农”之实。遗憾的是，这位“悯农”诗人，步入仕途飞黄腾达后，丧失了诗歌里的初心，直至蜕变成一个冷漠不仁、结党朋比、生活奢靡、滥施淫威的贪官酷吏。有书上说，他随着官职高升，生活上“渐次豪奢”，漠视百姓疾苦，每餐耗费动辄千贯。宋人笔记还提到李绅好吃鸡舌，每天杀鸡三百余只，做成一盘美味鸡舌，其余鸡杂弃之后院，堆积如山。

诗人刘禹锡曾参加过李绅邀请的一次家宴，写下一首《赠李司空妓》，记录下李绅“司空见惯”的穷奢极欲。“高髻云鬟宫样妆，春风一曲杜韦娘。司空见惯浑闲事，断尽苏州刺史肠。”高髻云鬟，歌姬美色。佳肴美酒，春风一曲。你李司空养尊处优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早已觉得平常，可我刘禹锡肝肠寸断，怎忍心目睹这样的场面。

最终，李绅从一个“悯农”少年，活成了一副他自己曾经讨厌的模样。大概，随着生存状况的改变，尤其是当个人的地位发生转换时，人的丑陋本性也随之暴露，而当内心的修养和环境的约束失去起码的制衡，昔日的《悯农》诗，成了打向他脸庞的一记响亮耳光。

以文鉴品，以品论人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认同这样的观点，但真要要把文章和人品直接挂钩，以诗歌的优劣来评判一个人的品性，或又是另外一个结论。事实上，有文品而无人品的人比比皆是，以我所知的那些历史上的坏人，不乏精于诗书画者，也多有爱菊种竹、赏莲赞梅的，但他们做起坏事来，哪里还有君子的模样？蔡京写得一手好字；秦桧科举出身博学多才，现在通行的“宋体”，据说就出自秦桧之手；和珅不但长得帅，还通晓满、汉、蒙、藏多种语言……最终，这些人却落下一世骂名。

“心画心声失真，文章宁复见为人”，这是宋金时期元好问的一句诗，说是笔下文章的文雅，不能证明作者为人的脱俗，作品的格调趣味不一定代表作者的人格品行，再次强调，以文察人难免失真。或有人断章取义，把过去的李绅和后来的李绅混为一谈，错把他当作好人了，好在历史的评判是公正的，青史留名抑或遗臭万年，真正的根源还在于自身。

王应麟：三千文章在人间

虞 璋 田永官

有宋以来，鄞县人才辈出，从宋朝一门三宰相的史浩、史弥远、史嵩之，到明朝首辅沈一贯、天一阁主范钦等，数不胜数。王应麟(1223-1296)，字伯厚，又字厚斋，号深宁，南宋庆元府鄞县人(今宁波市鄞州区)，早年为官，后辞官归乡专心著书二十年，是著名的经史学者，与胡三省、黄震并称“宋元之际浙东学派三大家”。今年适逢王应麟800年诞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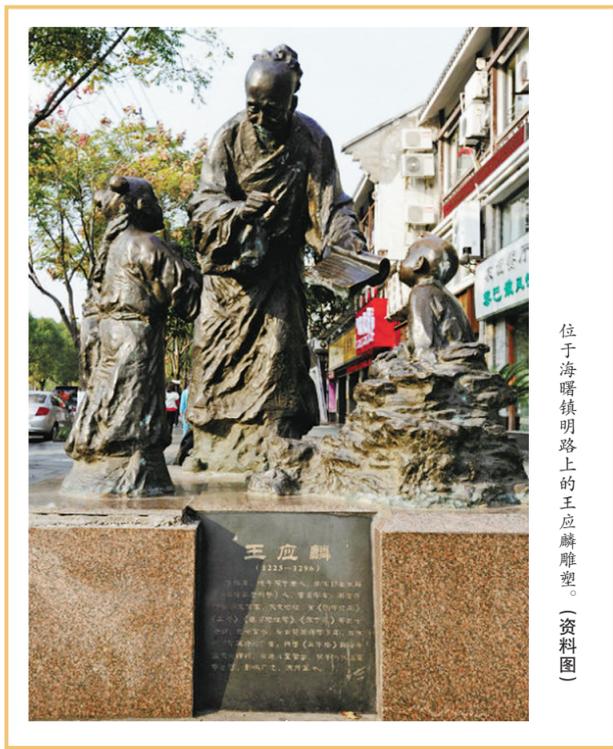
满腹经纶的旷世才子

王应麟少年进士，一生著述颇丰，有《玉海》《困学纪闻》《汉制考》《通鉴地理通释》等共计34种，近700卷。其中，《玉海》《困学纪闻》和《三字经》较有代表性。

《玉海》是目录学绕不开的大作，被清乾隆朝编修的《四库全书》收录，对其有按语曰：“《玉海》二百卷，附《辞学指南》四卷，宋王应麟撰。”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《玉海》包含天文、律历、地理、帝学、圣文、艺文、诏令、礼仪、车服、器用、郊祀、音乐、学校、选举、官制、兵制、朝贡、宫室、食货、兵捷、祥瑞等21门。《玉海》是宋代目录学的代表性著作，也是目录学在宋代的新突破，为各门学科提供史料，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史地位无可替代。

《困学纪闻》是一本重要的考据学著作，首开综合性、文献性传统学术载体之先河，奠定了传统典籍研究的基本模式，以考据之名居“宋代三大笔记”之首。与《玉海》相似，《困学纪闻》采用笔记形式，分类编排，这种文献学式的研究，构建起广博的知识结构。

《三字经》是古今中外耳熟能详的“蒙学之冠”，启蒙儿童700余载，经久不衰。《三字经》三三成句，朗朗上口，流畅自然且包罗万象，朴实无华又意蕴深厚，正所谓“人不学则已，学则必从《三字经》入手”。毫无疑问，王应麟应



位于海曙镇明路上的王应麟雕塑。(资料图)

是一位热爱儿童、懂得儿童心理的蒙学教育专家，即便在入元隐居之后，他仍坚持儿童教育启蒙事业。

《三字经》这本“袖里《通鉴纲目》”流传至今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“精华”“糟粕”之论争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实践证明它无愧于被称为千锤百炼的文化启蒙经典。《三字经》仿佛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简史，既有儒家的“中和”，亦不乏道家的“自然”，取众家所长于一身，启蒙儿童，烙印数百年中国人的哲学精神，教导不同情况下的处事原则、思想方法和行为模式。人们常说，“熟读三字经，便可知天下事，通圣人礼”，“如能句句知注解，子史经书一贯通”。

满腔赤诚的遗民

南宋灭亡，王应麟“深自晦匿，不与世接”。对王应麟入元的隐居生活，有关史籍上的记载惜墨如金、语焉不详，多以“后二十年卒”等语一笔略过。对于文史研究而言，没有记载，要么代表岁月静好，要么代表讳莫如深。南宋重臣王应麟，这位深深眷恋故国的“南仕”，在大片大片的历史空白中，以“浚仪遗民”署名著述颇丰，行文之中时间只题“甲子纪年”，不提年号，以彰显其志。他在《阙里集序》中写道：

舜侯赠余诗，曰“从来明月无今古”，此坡老所云“浮云世事

改，孤月此心明”。余不足以当之，而教我之意厚矣。“凡百君子，各敬尔身”，盖朋友相勉之诗也，愿相与切磋焉。

任尔“浮云世事改”，我仍秉一颗明心，这是何等之忠心。虽我“此心明”，但亦可切磋意见，和而不同，这是何等之气象。王应麟不是逃兵，他走得有理有据。宋亡后，故国之思仍在，心志托何物？唯前人之句可引。

人文合一的君子

翻阅王应麟著述，可见他对人与文之关系尤为重视。他坚持文与人相统一，在《困学纪闻》中，他说：“梁简文《诫子当阳公书》曰：‘立身之道，与文章异。立身先须谨重，文章且须放荡。’斯言非也。文中子谓：‘文士之行可见，放荡其文，岂能谨重其行乎？’”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偏向，难免带有很强的政治考量和现实目的。经历两朝更迭，王应麟不自觉反思南宋的国运，身为朝臣文士，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与思路，去面对这件他不愿又不得不接受的事。于是乎，他思考到最后，结果只能指向人和文。

表里如一，文如其人，是多数文人志士的追求。王应麟的这种坚持与他以君子身份约束自身是一致的，也影响着他对文风的喜好。譬如，他反对“卑弱”的文风，认为“卑弱”之文风出自“卑弱”之性格。王应麟并不是个纯粹的诗文评论家，其对于诗文的批评夹杂了许多非文学的因素，包括自身的经历以及他个人在道德层面的诉求。即便如此，也不影响他文学观念的深刻和价值。

南宋后，王应麟未再出仕而终身为士，文心不灭。《玉海》《困学纪闻》《三字经》三者如若各归一人，三人也当青史留名，却独归王应麟一人。既有赤子心又富爱童之心，文史哲人王应麟，八百年华如水去，三千文章在人间。

(作者单位：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)

漫画角



除污

赵玉宝 绘



大力士

杨树山 绘